

# 人人都是性變態

孫窮理

## ——回應臧汝興〈什麼才是真正的激進？〉

我們來玩個「連連看」的遊戲。「馬克思主義」對上「資本主義結構」。那麼和「性解放運動」相連的，就應該是「父權（家庭）結構」了。造成現代國家意識型態的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；而造成父權意識型態的則是以「家庭（族）」為中心的生產方式。

我們都生存在多重的結構性壓迫之中。我認為，任何一種對結構性壓迫的「理論」都不過是隨意的「解釋」。無論馬克思主義或「反父權」的論述，都不具備「真理」的資格（事實上，也沒有任何的一種「解釋」是「科學」——真理的……），它們都是連結「痛苦」與「行動」之間的紐帶。

在「破」報第四期，刊出了來自韓國，臧汝興的〈什麼才是真正的激進——從社會生產關係看豪爽女人〉，是從「馬克思主義階級運動」去看「性解放運動」，產生了若干視角上的盲點。其中的一些說法，經常可以在「左

翼前進分子」對「性解放運動」的批判中聽到，而現在，我打算從「性解放運動」這邊出發，去看看這種說法。

從對抗「父權結構」的角度來看。「性解放運動」不單單是「女性主義」的。它不應該被過於簡單地理解為「為（生理上）女性服務的」。這樣地「簡化」是一種「男性」（父權的）誤讀（並不是只有男性，才會有「男性的」誤讀……）。

首先，我並不同意「性解放運動」是對抗「性壓抑」的運動。因為，這裡已經預設了「無壓抑」的「性」。而在結構中，「性」本身即是一種「社會的建構」，並不是屬於人「本質的」東西（又有什麼東西，是「人本質」的呢？）因此，每一個人，他的「性」（也包括了「性冷感」——這也是一種「性」的模式。）全都是「性壓抑」的產物。如果，真的有所謂「性變態」的話，我可以這樣說：「人人都是性變態」。因為，他們都是經過「壓抑」「變了質的」產物。

以味覺為喻，人的味覺是多元多樣的，它有無限的可能性。每個人都會有獨特的味覺癖好，而「性」也是一樣。有些人用「變態心理學」的角度，

考察同性戀者的「病史」，說他一定是因為什麼什麼因素，什麼什麼經驗，產生了「性壓抑」，終於變成了同性戀。這樣對不對呢？或許對！可是我要說，如果是這樣的話，我們也可以回到異性戀者的「病史」，去找出他「形成」異性戀的「性壓抑」，因為，去除了社會外加的「控制、改造」的過程之後，我們根本沒有辦法去理解「性的癖好」的成因。從這裡，我們才說：「人人都是性變態」。

「性解放運動」是全面對抗「性道德」的鬥爭。要去除對「性」的審判。也就是去除「正常／不正常」這一個判斷的形式。「人人都是性變態」，再也沒有「正常／不正常」這一個判斷的形式。「人人都是性變態」，再也沒有「正常／不正常」的性了。

如此一來，「性解放」沒有「階級的」差別，它也是「超性別」的（從前，「異性戀」的男人，不是充滿「敬意」，就是充滿「敵意」，再不然就是「充滿了敵意的敬意」地在一旁，「觀看」著「性解放運動」，他們以前嘻嘻哈哈「好不正經」地談論著，現在，這些男人也可以「抓下來」一起搞了）。

臧文，無異是「父權結構」打壓「性解放運動」的本文，只不過是用上了「左翼、基進」的形式。在根本上，仍是「結構的防衛」，因為「建構主體」對於「反抗結構性力量」的「意識型態上的恐懼」。它的根源，與「衛道人士」的「道德」是一樣的。

意識型態，不單是為「階級利益」服務，它更是為「結構的安定」而存在。因此，一個「無產階級」，他也可以滿腦子是「維護資本家利益」的「資本主義意識型態」。而一個「女性」也當然可以滿腦子是「父權的意識型態」。（臧汝興是男是女我也不知道，他名字裡有半個「女」字，搞不好是個女人喲！）

使用理論／理性（無論它是醫學、生物學、心理學、社會學、法學還是馬克思主義）來打壓（指導）非理性／慾望，不就是男性中心常見的策略嗎？……

我不否認，「父權結構」和「資本主義結構」是緊密地相連著的。這兩者都不是對當今世界「完整的」描述。因此，它們都不能「蓋括」此世人類所遭受的「結構壓迫」。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認為社會主義的理想實現之

時，性別壓迫的問題就會消失，就是將「結構壓迫」單純地視為「資本主義結構」的結果，固守這種單一化的解釋，使得「性別壓迫」的問題，無法從物質基礎上思考，因此，相對於「階級革命」，便被用「先後」問題排除了。我認為，即使這兩者之間有複雜的牽連，但仍應該分開來看待，在運動策略上，是相互獨立的，沒有「先後」的問題，它們有不同「物質基礎」與「革命對象」。

在臧文中概述了資本主義形成過程裡，「家」和「兩性」關係的演變，卻關鍵性地遺漏了它們在資本主義形成之前的情形。難道，沒有資本主義，就沒有「父權」和「家庭」了嗎？而這一個遺漏，使得他將「父權」與「家庭」解讀為資本主義的「現象」，這才會認為「性別」的問題，是「表面」的問題。事實上，從人類「有生產方式」以來（人類，是不可能沒有生產方式的），父權結構即已在逐漸形成，到了「資本主義」開始之初，它就牢不可破地存在著了。而作為「新的」結構性力量的資本主義，和這個「舊的」力量，相互結合、轉化，才變成了臧汝興所描述的種種形式。

從這個角度說，在資本主義結構中，因為生產力的需求，解放了女性的

經濟地位，這使父權結構（家庭制度）受到了一定程度的「撼動」，從莊園經濟的大家庭，女性全然沒有掌握經濟上生產力的可能，到今天小家庭，甚至「無家庭」，女性有了掌握生產力的機會，資本主義對於「父權結構」的挑戰，可謂「不無功勞」，臧汝興說，現代家族，已經從「生產單位」，變為「單純的消費單位」（實在不知何解？）那是根本拒絕從「生產關係」上去理解「家庭」，因此才會有「不知道父權制度的物質基礎是什麼」的說法。如果，我們可以假設一個以個人為生產單位的社會，性別分工不再是掌握產力的基礎（在這裡，根本沒有家庭這一個生產單位），那麼，「父權結構」的支持力量，還會剩下多少呢？

因此，我認為，「性解放運動」是符合「唯物史觀」的。

臧汝興用死硬的教條解釋歷史，硬是把「父權」看作資本主義的「現象」，變成了「性控制」如果不在資本主義的脈絡中根本無從理解（如果，照他的解釋方法，中國婦女的「纏足」、「貞節牌坊」這些東西，都不是「性控制」了）。他在分析男性於父權結構中的「利益」只限於「經濟上」的利益。

有三個理由，使他認為「男性勞動者並未因性別差異真正獲利」。第一個理由說：「資產階級用性別歧視穩固其支配基礎的結果，勞動階級的受壓迫處境，更加艱難。」至於資產階級是「如何」用性別歧視來穩固其支配基礎呢？那是用他第二和第三個理由的那種方法。因此，是以第二和第三個理由為前提而成立的，沒有了第二和第三個理由，第一個理由也就不存在了，這語言遊戲，是硬湊出來的。

現在，我們來看看第二個理由：他認為因為勞動階級女性擔任家事勞動，使勞動價值下降（男性勞動階級因為有人幫他分擔了家事勞動，使他的勞動價值提升，而薪資沒有改變，所以說「勞動力的價值下降」）。以家庭分工來思考對勞動價值的影响，本身並沒有問題，可是他完全忽略了女人也是「人」，她為什麼要（在家庭分工中）進行「無償的」家事勞動，而在社會分工中，進行（相較於男性）「低償的」勞動呢？男性的勞動價值是「下降」了沒錯，可是女性呢？他的勞動價值，卻根本是「零」（在家事勞動裡）。

這就是他忽略了以「家庭」作基本生產單位這一個「生產方式」的結

果，沒有「個體」，只有「家」這個「整體」，於是，他可以不顧「男人有收入」、「女人無收入」這一個事實，說「男人沒有獲利」。「家」已經小到不能再小，只有「家」（男人）的收入，而沒有「女人」的收入，所以也用不著比較（真是的，哪有人在說「男人沒有獲利」的時候，不去和「女人」作比較，而在那裡自說自話的啊！）。

第三個理由，更加地是「見樹不見林」得莫名其妙。女性投入勞動市場後，因為「工資低廉」所以牽制了男性的工資，可是為什麼女性的工資要比較低呢？這就好像說，現在有了機器，所以人工不值錢了一樣，根本不把女人當人看，難道男女「同工不同酬」這件事比它「壓低男性工資」這附帶效果，更加地「表面」，更加地「不重要」？

「勞動階級」女性的「經濟生產價值」在以家庭為物質基礎的「父權結構」沙文觀點中，被「一筆勾銷」，臧汝興的說法，可以做為「範本」。它不僅只是一個「不合邏輯」的「怪論」而已。

另外一個重要的問題是，馬克思主義批判的力道，在於「物質基礎」如何「決定了」「上層建築」。而不單單只是在「物質基礎」中打轉，否則，

根本稱不上「唯物」。「經濟決定論」不去說「經濟決定了什麼」，那還能稱之為「經濟決定論」嗎？

他所提到的（也或許就是他所意識到的）「女性弱勢」問題，全部都是「經濟上」的問題，因此，我認為，他根本還沒有開始意識到「性控制」這個東西，也就還沒有「開始」和「性解放運動」對話。

「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生產方式」是「父權結構」的物質基礎，而「異性戀的『正常』男性」，則是這一結構的「既得利益」階級。從此而開展的「上層建築」包涵了「性道德」（也有「非性的道德」是為它「服務」的，如：孝道）、「愛情觀」、「兩性關係」、「性別差異」……等等，這些因時代而改變的意識型態，構成了各種態樣的「性控制」。性解放運動從對抗這些「性控制」出發，而終究要回到從「物質基礎」上的「根本革命」——瓦解「家庭」這一個「猥褻」的（把這個名詞還給它的）人類組織（生產方式）上去！

臧汝興指責何春蕤認為女性的被壓迫與「能力」有關，是與「資產階級訓誡勞動者」的說法相同。我認為根本是誣賴，在亂扣帽子。

何春蕤要女性在「性」上面積極、主動、創意、不用賺賠哲學，就是要打破女性「能力」上弱勢的迷障，好像要工人團結起來，掌握「生產工具」一樣。女人的身體，就是女人生產慾望與快感的「生產工具」，必須要自己掌握，「男強女弱」與「資本家（能力）強、工人弱」一樣，是意識型態的建構。臧竟然可以用何指出的「錯誤意識」強加於何之上，用她反對的東西，說成是她的東西，這種離譜的誤讀，恐怕不單單是他沒有下功夫理解「性解放運動」而已。

臧汝興認為「性解放運動」只能「攪亂」父權結構，而不能「打破」它，這一點，我同意，但是，絕不代表我認為「階級運動」可以打破父權結構，我反而要問：難道「階級運動」可以「打破」資本主義結構嗎？

馬克思給了我們一個無產階級天堂的神話，可是，到了今天，二十世紀九〇年代，這個神話只有越來越遠了，也許臧汝興還相信它吧！（相信不相信是個人價值，無涉對錯問題，它們都是可貴的！）但我認為，結構的問題，只有結構性的力量才能改變，身處其中的人是被決定的，在那些物質基礎之前，任何的運動都無能為力！

然而，這種悲觀的處境，卻不能，也不應該消滅我們運動的能量，反而，我們要在大革命神話消解之後，依賴自我的意志而行動下去。「性解放運動」如此，「階級運動」又何嘗不是這樣呢？

「性解放運動」陷在一個雙重的框框裡，無法脫出。第一個框框，是階級的框框。這一點，臧汝興與其他許多運動者都質疑過，我也要同樣地質疑，如前文所說的，它在本質上，並非具有「階級屬性」。「性控制」存在於任何一個階級之中，絕不是「中產階級」所專屬，而今天，若它真的只能在「中產階級」中動，則應質疑，是不是「中產階級」的沙文主義在其中作梗？讓無產階級的男、女脫離家庭的魔掌，消滅已有的、未來的家庭及其意識型態，應是運動的目標（「資產階級」的女性，就好解放了嗎？瞧瞧連方瑀，或是王永慶的三個老婆吧！）。

另一個框框，是性別的框框。「男人」作為既得利益階級，實在有「動不得也」的困難，這唯有賴於發現「男人」這一個建構，對於每一個男人他具體的慾望、身體，經由「性控制」造成了多大的傷害。每一個「性變態」，當你們被製造成「男人」之後，意味著「可能性」的消失，也許，到

那個時候，才會驚覺，原來「經濟地位」的強勢，背後竟是一個被「切割」而「異化」——人和「慾望」異化，和「身體」異化的事實。唯有在這裡，我們才會發現，男人「實際上並未獲利」這件事。

「性解放運動」作為一種「基進」論述，和「階級運動」應該是並存的，兩者之間，不存在「先後」問題，也不能夠相互取代，因為相對於「中心」的宰制，向於「邊緣」的「逃逸路線」有著無限的可能性……

(1995年12月1日破週刊)